

2019年—2023年，公安机关查处的治安案件年均超800万起，涉及人数庞大，其中多数是轻微违法。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2023年，公安机关查处的治安案件年均超800万起，涉及人数庞大，其中多数是轻微违法。这些治安违法记录往往会对当事人的生活产生诸多限制，如在升学、考公、求职、评优晋级等方面，甚至还会对其亲属产生连带影响。例如，18岁的安徽男孩小阳因动手打人被处以治安拘留，此后在征兵和应聘酒店服务员时，均因治安违法记录而被拒绝；陕西一位农民因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导致女儿在教师考试中无法通过政审。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消除这些负面效应。它采用“封存为原则、查询为例外”的设计，既避免了违法记录被不当披露，保障了个人权利；同时规定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可进行查询，满足了行政机关内部管理和维护社会安全的需要，在保障个人权利与保护社会安全之间实现了价值平衡。这一制度的实施，将使许多有过轻微治安违法记录的人放下包袱，重新融入社会，减少社会歧视，

促进社会和谐。

法律实现衔接， 执法仍有挑战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与其他法律的衔接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以构建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胡裕岭提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监察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都进行了有效的衔接。例如，在高空抛物、校园欺凌、出售个人信息等问题上，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相关规定相互配合，形成了对这些违法行为的梯度治理。对于一些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由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规制；而对于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则由刑法进行惩处。

荆亚斌也指出，在宠物伤人事件中，不仅涉及民事侵权赔偿，还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行政处罚，实现了行政处罚法与民法的衔接。在未成年人处罚问题上，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衔接，形成了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全方位治理体系。

当然，新修订的法律在实施过程中，执法部门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胡裕岭认为，在判断正当防卫行为时，虽然法律有了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仍然具有一定难度。这需要执法人员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利益的衡量、损害的破坏程度、防护人员的防护力度和主观动机等。

在未成年人违法处罚方面，荆亚斌表示，虽然法律明确了在特定情况下对未成年人可以执行行政拘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如何准确界定“情节严重、影响恶劣”以及“一年内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等情形，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标准。同时，在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治教育时，如何确保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也是执法部门需要面对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专家们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胡裕岭建议，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对新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通过案例指导等方式，统一执法标准，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荆亚斌则认为，应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同时，执法部门应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解决治安管理中的问题。■